



审思与扬弃：“人的本质力量”的人工智能对象化

王敏光, 赵怡然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 “人的本质力量”是人通过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改造自身与世界的重要力量。作为对象化成果的人工智能,其涌现出的“智能”属性引致颇多幻象。因此,有必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异化与对象化之别,回溯“人的本质力量”的理论依据,把握人工智能与人类能力的界限,开拓“人的本质力量”的可能性边界。事实上,人工智能虽被冠以“智能”称号,但这种“智能”表现为可量化计算的属性,源自人类赋予的机械创作,归根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突破与确证。审慎对待人工智能的“超越性”与“智能性”,不仅能够理论上扬弃浪漫主义的异化批判思路,更有助于借助虚拟手段敏锐洞悉必然性的发展趋向,开启智能时代“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新篇章。

关键词: 人的本质力量;人工智能;对象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 B0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2-0050-08

Reflection and sublati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beings"

WANG Minguang, ZHAO Yira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beings" is an important force that enables people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through perceptual and objective activities. As an objectified outcome, the "intelligence" attribute that emerges fr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led to many illusions.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methodology to trace back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beings"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lienation and objectification, grasp the boundary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capabilities, and expand the possible boundaries of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beings". In fact, alth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labeled as "intelligence", its so-called "intelligence" is manifested as quantifiable and computable attributes, originating from mechanical creations bestowed by humans. Ultimately, it is a breakthrough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beings". A cautious approach to the "transcendence" and "intellig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t only enables us to abandon the romantic critical thinking of alienation in theory, but also helps us to keenly perceive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rend through virtual means, opening a new chapter in the reality of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being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Key words: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being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bjectification; alienation

相较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技术,人工智能在加速迭代的过程中使人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原因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自行做决策、创造新想法的技术”^[1]。正是这种特殊性,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围绕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从不同层面探析了人工智能对人的本质的影响。视角的分野体现在理论阐述中亦会存在差异,总的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异化”视角,分析人工智能业已产生的社会效应在何种程度上与人的本质相悖。例如,孙伟平^[2]指出,人工智能的不成熟性正加速转化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由此引发的诸如人的“边缘化”“社会排斥”等一系列“新异化”现象,频繁为智能时代敲响警钟,需给予重视并审慎处理。余乃忠^[3]认为,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发展的关键制高点,堪称人类与自然力量的一次重要和解。尽管在现实情境中,由“异化”引发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但在理论维度上,已然形成积极的“异化”指向,彰显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的本质力量”。二是立足“主体性”命题,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形成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合理规束。如,张劲松^[4]认为,现阶段人工智能的工作程序无法脱离对人类认知方式的模仿,是人类创造并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功能与特性,因而,人是机器的尺度,标定了人工智能不可逾越的界限。段伟文^[5]认为,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已呈现一定的“主体性”特征。然而,此“主体性”与人类所具有的意识能动性存在本质差异,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模拟,所以应将其界定为“拟主体性”。尽管如此,仍需运用相应的伦理准则对其加以规范。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对人的本质的影响研究已呈现诸多新观点,这有助于从不同视角回应对“人机关系”的质疑。然而,总体而言,无论是异化对人的本质产生的影响,还是发挥人类主体性以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本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把人工智能视作与人类相对立的异己之物。实际上,人工智能并非凭空出现的事物,尽管其引发的现实忧虑与潜在风险值得关注,但其研发过程与生成逻辑同样涉及对人的本质的思考与确证。当前,霍金所担忧的问题已上升为全球性忧患,库兹韦尔提出的“奇点”问题加剧了人类的恐慌与焦虑情绪,有关人工智能“末世论”的预言更是促使技术批判思潮再度兴起。面对诸多繁杂且观点不一的声音,亟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审慎考量人的本质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

以“人的本质力量”作为理论基础,从“对象化”视角出发,将人工智能引发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再思考置于哲学与技术发展的时空框架内,探究在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进程中,人工智能这一特殊的技术形态如何实现与“人的本质力量”的时代性“邂逅”。

一、“人工”之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生成

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技术发展的关键阶段,人类在对其出色的工作表现惊叹之余,也滋生出诸多技术层面的忧虑: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异化现象?人类独有的主体性是否会丧失?这些思索本质上反映出判断边界的失准与模糊,若不能厘清人工智能与人类能力的界限,便难以研判二者关系的未来走向。在此情形下,有必要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探寻“人的本质力量”的理论支撑。

(一)异化与对象化:回溯“人的本质力量”的理论依据

针对人工智能的批判观点众多,以异化为主要批判切入点的情况亦颇为常见。既然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的方法论,那么就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展开系统梳理。“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时期,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哲学观点的启发,其异化概念亦承继了费尔巴哈开展宗教批判时所采用的话语范式。在《基督教的本质》开篇,费尔巴哈首先区别人的本质与宗教的本质,主体为了能够更为清晰、直观地认知自己的本质,便创造出一个被规定为上帝的对象,并把自己的本质赋予这一对象。“使自己对象化”^[6],成为宗教真理的阐释方式。但费尔巴哈同样敏锐地察觉到在宗教对象化的特定阶段,这种对象化会同步发生异化,主体不再凭借上帝这一对象来直观自身本质,而是疏离自身,这恰恰构成了神学得以广泛蔓延、盛行不衰的场域。费尔巴哈进行宗教批判时对异化与对象化的区分,给马克思以莫大影响,这一方法和视角也保留在《手稿》之中,成为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的重要理论工具。在马克思的视域下,异化虽以概念形态呈现于理论之中,但在现实生活里,异化现象蕴含着两个关键前提:其一,唯有从主体出发生成客体,才会引发异化;其二,需明确异化问题具有历史性,它既有形成的条件,也存在消灭的途径。倘若无法厘清异化的前提与界限,便难以将其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思考建立关联。

马克思认为,劳动所创造的产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呈现。简言之,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将自然界转化为自身“作品”的进程中,人得以确证自身具备此种现实力量,即“劳动的现实化即为劳动的对象化”^{[7]47}。但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下,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非现实化,体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7]47}。这种情形与宗教世界的境况颇具相似,“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7]48}进行这一区分具有不可忽视的必要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特别强调,他在阅读过《手稿》后意识到了“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的这一“根本的和严重的错误”^{[8]19},倘若将二者混同,那么社会主义在消除异化的同时,必然会致使对象化被一并消解。而此时卢卡奇已经意识到无论是客观物的外化,还是人类进行交往时的情感表达,都是对象化的体现,绝无可能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彻底消除殆尽。异化当然要以对象化为前提,但并非任何的对象化都会即刻转化为异化形态。“只有当社会中的对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质与其存在相冲突的时候,只有当人的本性由于社会存在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到一种异化的客观社会关系,并且作为其必然的结果,谈到内在异化的所有主观表现。”^{[8]20}需要明确的是,进行异化与对象化的区分并不是“粗野地割裂”,而是强调二者“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9]34-35},是发生于“人的本质力量”内部活动的差别。马克思承认异化现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长期存在的必然性,指明“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对象性活动都将“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7]85},但从长远来看,二者共同指涉“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

当下,愈发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将人工智能引发的一系列异化现象界定为“新异化”,这表明人类始终在哲学维度关注不同历史阶段异化可能产生的威胁,持续对异化现象开展批判性审视,并全力以赴探寻摆脱异化困境的可行路径。在《手稿》中,马克思不仅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实,同时还提供了解决异化的道路,“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7]75}。这一极具启发性的命题彰显了马克思有别于其他哲学家的批判高度,并非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浅尝辄止,从更为根本的目的而言,还是一项关涉“历史—实践”的事业^[10]。马克思在这里认为,异化问题的出现与异化的解决遵循着同一条道路,只有当异化问题发展到特定的转折点时,扬弃异化的条件才有可

能积极主动地生成与涌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层面上提供了一个扬弃异化的方案,但是并没有“在哲学层面上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作一劳永逸的处理。这与马克思哲学本质上的批判性和开放性有关”^[11]。由此观之,“异化”是一种现实体现,更是一个历史过程,给予当下世界以新的理论活力。

(二)人工与人类:开拓“人的本质力量”的可能性边界

关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超越或替代人类的质疑,在哲学层面体现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会使其获得与人类存在同等主体性地位的问题。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证人类的主体地位。人类之所以被定义为人类,是因为其天生具备某种规定性,正如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9]31},在明确人类规定性的同时,也划定了人类与其他事物的界限。因此,阐明边界是对事物本质的深度反思,既涉及对边界内外对象关系的深入厘清,也关乎对界内作用力合法范围的审视。然而,人的本质的限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7]85}这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实现,并非封闭于主体精神的自足循环,唯有在历史的对象化生成中才具有现实的考察意义。若仅从理论层面尝试界定人的本质范畴,那么所获本质必然是抽象且匮乏的。唯有借助对象性活动,在与对象的交互进程中,方可持续为“人的本质力量”赋予现实内涵,进而达成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认知。当下,关于人工智能侵犯人类主体性的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未能从本质差异的辨析中,精准把握人工智能与人的能力边界,从而阻碍了二者关系的未来发展。实际上,探讨边界问题,不仅在于明确人工智能的能力局限,更在于对“人的本质力量”潜在发展方向进行前瞻性研判。

一方面,正视人类感觉器官的有限性是理性对待人工智能超越性的前提。人类借助感觉器官与世界发生联系,归纳总结出共相与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各具特色、体系完备的学科知识体系。从人类的感官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层面考量,“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7]84}纵然人类感觉器官的先天性为其开展感性活动提供了必要前提,但感官的匮乏性会随着认知的深入而逐渐凸显,这些限制因素在某种程

度上激发了人类对可延伸性工具的探索。从传统手工工具向自动化体系的演进,在对四肢功能的模拟进程中,为繁杂、单调的体力劳动探寻到了可替代的工具;计算机向人工智能的跨越式进阶,堪称大脑模拟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让人类的感觉器官乃至神经系统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明中得以拓展与解放。因此,马克思才提出“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7]82}。人的感觉器官与感觉需求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工具的变革而持续丰富与提升。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所展现出的超越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对实践活动局限性的一次次深入探索,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不断得以确证和丰富的深刻见解。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诞生与迭代是人类“合力”交互作用的实践结晶。从主体区分角度而言,人类个体与人类整体具备截然不同的主体内涵与价值导向。人工智能自诞生之后,在技术迭代进程中达成了从数据计算到内容生成、从语音识别到面部认证、从具身交互到空间感知等多维度的突破性进展,此类成就绝非任何单一人类个体所能达成。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软件芯片的研发创新、硬件设备的制造生产,亦或是各类模型的计算模拟与仿真分析,均依赖于不同领域不同地域劳动者的实践创造与经验积累,蕴含着人类整体的智慧与创造力。尽管从表象来看,人工智能被赋予人类个体外观,营造出单个人与单个机器人之间的竞赛,但透过本质可观,所谓的“人机竞争”不过是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整体的人类”之间的竞争^[12]。一言以蔽之,从对象化视角理解人工智能的本质表明,人工智能所呈现出的超越性仅体现为在部分领域对个体的超越。鉴于人工智能本身是对人类整体知识的信息存储与融会贯通式调用,故也体现为人类整体对“人的本质力量”既有边界的超越、革新与拓展。它并非限制人类的敌对力量,而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又一次公开彰显。

二、“智能”之思:被赋予的创作特性 与人类创造性的根本差异

伴随人工智能逐步向“生成性”维度演进,其似已具备一定水平的自主学习与自主决策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类对自身主体性的不确定认知。此类质疑产生的根源在于对人工智能“智能性”的认知含混与理解局限。尽管人工智能被赋予“智能”之名,然而这种“智能”与人类智力实则差异显

著。试图将“智能”创作归结为人类的创造性生产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偏差”。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廓清人工“智能”的被赋予属性,能够为正确认识人机关系提供关键的方法论准则。

(一)人工“智能”表现为可量化计算的属性

人工智能作为人脑重要的辅助手段,不断延伸并强化了人脑的机能,并在很多方面突破了人脑的局限。在信息储存方面,大脑的记忆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模糊,而数据作为人工智能的记忆,在确存储容量的基础上,便可以实现信息永存。在抗干扰能力方面,人类只能在身体容忍的界限内正常工作,而人工智能已然可以在超越人类身体极限的环境中完成任务。如果说大机器体系为了最大程度模仿人类四肢以代替人的体力劳动,那么人工智能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核心的工作逻辑是模拟人类智能。然而,人类所具备的能力构筑了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各种能力之间相互交叠,并不能归结为非此即彼的体力或智力。而人工“智能”之所以可以接近、模仿甚至超越人类智慧,归根到底是将人类的能力分门别类地拆分开来,并寻找能够通过计算转化为符码的内容。这是一种计算主义的逻辑。正如霍布斯所主张,人类复杂的理性思维能够被还原为最为简单的加减运算模型。计算主义表征着标准化与合理化,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的20世纪,泰罗制借助计算性原则,打破了传统经验管理的混沌局面。然而,诚如卢卡奇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供的深刻预见,标准化意味着劳动者需摒弃一切个性与差异,以绝对服从生产逻辑为准则,且不进行任何创造性的增添。因为创造性意味着不确定性和风险,脱离了计算与分析能够触及的范围,而“越来越表现为错误的源泉”^{[8]156}。

从人工智能的知识基础层面审视,其工作程序依托于人类智能中可量化、可符号化内容的投喂。然而,人脑中可进行编辑与计算的内容,仅是常规化、逻辑化意识的极小部分,诸如个体禀赋、智慧、创造力与想象力等特质,显然难以通过具体的数字或符号进行精准表征。倘若“可计算性”是当前人工智能运行的主导条件,那么这也成为衡量其所能达到的“智能化”程度上限的标准。因为计算本质上意味着重复,并不包含任何创造性成分,其发展进步实则源于人类创造能力的提升。

(二)人工“智能”源自人类赋予的机械创作

人工智能对于世界的感知与行动,与人类通过感官形成的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与实践,有着根

本的不同。尽管当前,具身智能的发展赋予了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属人”的特征,不仅使智能机器人配备了仿真四肢与感官雷达,而且可以通过对环境数据的监测,自主调整下一步动作,灵活规避风险。但是这种“感知能力”完全基于字符的逻辑序列,是一种“数据感知”。康德区分了人类知识体系中的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借助于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且只有感性才给我们提供出直观;但这些直观通过知性而被思维,而从知性产生出概念。”^[13]因此,感性意味着当对象呈示之际,人具备接纳对象刺激的感知能力,而自发性、创造性则是知性领域发生的思维活动。但是,人工智能展现出的“创造能力”并非康德阐述的在知性范畴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而是在接收到工作指令这一外部“刺激”后,在已经建立好的数据库中进行精准检索,筛选出适配的内容并予以输出,被赋予的数据越庞大、越丰富,人工智能所展现出的“智能”程度便愈高。可见,人工智能的“思考”与“言说”在本质上呈现为一种数学映射关系。这种所谓的“创造性”乃是由人类赋予,并在后续的操作与应用过程中逐步熟练运用的表现。一旦脱离预先设定的内容,人工智能便难以实现自主且自觉地创作输出。正是由于人工智能缺乏与现实世界进行真实互动的感知能力,其必须依托人类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与实践来构建数据模型,这也成为其创作能力的根本性局限。

尽管人类感官存在一定的感知阈限,然而这仅体现为量的限制^[14]。借助感官与世界建立直接联系,是实践活动开展的基本特性。在此情形下,感官的有限性使人类关于生活世界的感性经验始终维持开放性,蕴含着有待释放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引发了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与认知,推动“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作品中得以对象化。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7]81-82} 尽管人工智能可依据给定指令,迅速捕捉符号与创作活动之间的联系,但此种联系并不表明其能真实生成现实世界的感性经验,仅体现为一种机械式的数据处理过程。故而,人类的实践活动与人工智能的机械创作存在显著差异,能够在与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交互过程中形成真切的生命体验,在对现实的反思与规划中实现思想灵感的迸发,创造出先前未曾存在的对象,人工智能本身亦是这种创造性活动的成果。

(三)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突破与确证

从人工智能的功能特性而言,其“智能”属性在极大程度上达成了对人类自然能力的拓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智能化水平于劳动形态和社会关系范畴,均产生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深远影响。

一方面,高阶智能化呈现出劳动替代特性,这意味着新的劳动形态对“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了又一次关键突破。当下,智能机器人凭借其出众的工作能力,在诸多特定领域的工作表现显著超越人类,且广泛应用于人类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然而,矛盾之处在于,那些原本长期受限于简单、重复性或高危、繁重岗位的劳动者,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正面临着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职业风险。正如马克思敏锐洞悉到的那般:“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反面”,“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15]776}。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对抗蕴含着劳动解放的潜在发展趋向,尽管在目前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悖论的人类发展迷局。理论与现实之间共同指涉的问题在于人工智能是否会代替人的劳动?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7]89}。若劳动能够被人工智能取代,那么,不仅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保障体系将出现崩塌,高层次的人类意义追寻也会随即面临潜在的危机。实际上,由人工智能展现出的这种劳动替代特性并非对劳动本身的彻底摒弃,而是促使人类从固定的、受拘囿的重复劳动中退出,更多地从事创造性的活动。由此观之,人工智能改变着人类的劳动方式以及劳动过程中与自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变革既是人类对自身现有状态的否定性超越,也是生产力对旧有模式的革命性扬弃,彰显着“人的本质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另一方面,智能化素养是新的世界历史给予“人的本质力量”的又一确证方式。诚如马克思所言:“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上升为熟练技巧。”^{[9]34} 这种“素养”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反复的需要”刺激下,在与对象的不断磨合中,内蕴为主体的基本素质,外化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体现,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人工智能发展初期,为寻找实现人工智能现实应用的技术路径,不同领域的专家展开对人类神经中枢、认知、意识等方面的研究,以期实现人工智能最大程度的

拟人化。如今,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然深刻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之中,重塑劳动、交往与认知的方式,其发展更是依托全球性的合作与数据共享。人类整体置身于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之中,世界犹如一张密布的智能网络,将各个民族和地区联系在一起,大幅提升了资源共享、优化配置的效率。这就决定了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属于跨学科体系,绝不能仅仅从人类生理或心理结构上研究它,更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可以预见的是,智能化技术已然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领域。为在技术发展中占据优势地位,各国展开了激烈角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公民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备智能化素质,正逐渐成为衡量该国家或民族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这就要求各国加强科技研究,培育具备创新素养的高技能人才,以实现核心技术攻关与突破。而在与前沿技术的交互过程中,构建规范化的智能应用方式,推动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全面智能化素质水平,正成为更为重要的竞争焦点。由此可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而言,谁能在对人工智能的精准把握中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谁就能率先迈入智能时代的前列。

三、“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批判路径与现实场域的双重扬弃

20世纪下半叶,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显著加快,随着“人工智能+”实际应用场景的多样化,其给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亦引发了产学研各界的广泛关注。对这一现象作出回应,既属于立足现实的问题,也属于面向未来的问题。然而,人类需要反思的并非人工智能这一技术本身,而是要自觉发挥“人的本质力量”,为应对新变化做好充分准备。这不仅要求在理论层面审慎考量技术批判的路径,更要求在现实与可能性的互动张力中,精准把握人工智能虚拟性所预示的未来走向。

(一)扬弃浪漫性:审慎对待“人的异化”的人工智能批判思路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要素,人工智能正促使社会生活发生全新的变革,甚至不断挑战着人类的自我认知。在焦虑与不确定感的笼罩下,将人工智能神秘化、绝对化的批判言论层出不穷。赫拉利提出,人类当前已步入由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推动的“神人革命”阶段,与前三次革命不同,此次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物本质。例如,传统上由人类主导的职业领域正逐渐被人工智能所侵蚀,创

造力与情感表达等体现人类独特生物算法特征的方面也面临着全面贬值的风险,在数据处理效率上已难以与智能算法相抗衡,由此产生的大量“无用阶级”将成为进化链条中的“冗余物种”^[16]。事实上,鲜有人能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脱离数字化、信息化的辐射。因此,大可不必过度沉溺于悲观的思维窠臼之中,像韩炳哲宣告的“智能牢房”那般,“在被算法控制的世界中,人日益失去了他的行动力、他的自主性”^[17];更不必效仿“新卢德主义”的诗意大锤,企图在智能时代由技术引发的焦虑和不确定感之中寻找回归简朴、传统生活的浪漫主义方案^[18]。回溯不受算法与技术干扰的前数字时代,并将其作为主体性复归的途径,此种批判思路常具空想色彩。这恰似严厉批判现代世界的浪漫派代表人物:作为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代表的卢梭,将自然状态视为人类文明的鼎盛阶段,指出现代世界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主题,“在完善人类理性的同时,也使人类败坏了”^[19]。可见,卢梭的民主思想建立在对自然的推崇以及对资本世界摒弃的基础上,从而被后世尊为浪漫主义的先驱^[20];身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蒲鲁东,视私有财产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然而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上,他并未对所有权的社會历史展开深入探究,而是将整个理论思考构建于抽象的法权基础之上^[21],凸显出空想的无力。尽管上述诸多批判思路初看起来激进且极具吸引力,但其存在的共性问题不容小觑:其一,试图于人类历史的原初状态中探寻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实则不过是虚幻、脱离实际的臆想;其二,不触及特定的社会变革,而仅仅执着于人类的道德反思与伦理改良,终究难以触及资本主义矛盾的真正根源。诚如黑格尔所言,这种“无可奈何的逃避”大多是受“浪漫想法的特殊引诱”^[22]。既然不认可历史退步论,那么对于智能社会的思索与审视,就迫切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坚实基础予以回应和阐释。

尽管马克思未曾亲身经历人工智能为当代社会所带来的诸多变革,但其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对机器体系的思考,仍具备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从机器体系到人工智能的演进逻辑,实则彰显了人的对象化成果在生产工具领域的时代表征,其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的具体展现与生动体现。借助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视角,能够更为理性、全面地审视人工智能的异化效应,并探寻切实可行的化解路径。异化问题的出现同时也昭示着消灭异化的条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7]78},即

必须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在这种情况下,铲除异化现象的现实根基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之上,否则只会带来“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3]。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若无法运用辩证的思维范式来审视并妥善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异化“插曲”,那么,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诉诸回归前智能时代的诉求,试图在“复得返自然”中探寻解决现代性危机的生存路径;抑或受“技术悲观主义”主导,构建乌托邦式的道德幻象,主张暂停更高水平人工智能研发的极端举措,均等同于对生产力发展进程的强行阻碍,本质上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开历史倒车的行为,皆非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正确应对方式。当下,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的发展热潮,社会各界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和伦理冲击予以高度关注。若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技术领域的“头雁效应”,需以辩证、历史的视角审视不当的技术批判,深入现实情境,从具体问题切入,强化人类的引领作用与建设性参与。我们既要满怀信心地迎接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广阔前景与宝贵机遇,又要构建严谨规范的制度体系,以此驾驭技术的发展。

(二)扬弃虚拟性:打开智能时代“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新篇章

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的颠覆性,就在于其引领了中介系统的重大变革。一方面,人工智能将交往置于虚拟空间之中,在社会关系的充分延伸中,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生成逻辑。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135}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象化的现实活动中,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历史生成。由于交往的迫切需要,语言和符号作为早期的中介得以产生,这种交往仅能局限于有限的空间范围之内;印刷术的发明使书信成为人们交往的主要方式,如果说“从前车马很慢”,那么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与邮政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朝发夕至”的愿景已成为现实图景。如今,手机已然成为社会关系展开的主要中介,通过指尖在屏幕的敲击便能完成情感的顺畅传递与需求的清晰表达。智能终端的普及证明,人工智能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成果,在其投射的虚拟世界中,心灵与心灵的碰撞获得了更为自由、多元的呈现形式,实现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充分延伸,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交往广度与深度。可见,技术的进步

蕴含着时空的压缩,昔日难以跨越、无法克服的自然力量与人类达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和解,这种和解必然带来人与人关系的重大变革。

另一方面,人类改造世界的进程既是思想的现实化进程,更是现实趋近思想的进程,二者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实现。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5]11}在这项运动中,双方以对方为中介,相互依存、彼此互动。在解决灵魂与肉体对立这一问题上,笛卡尔意识到:“这里有取得一个中介物的需要,神就被当成了这样的中介物。”^[24]当下,人工智能被视作当代世界的“新神”,尽管支撑人工智能运行的数字界面并非由某种神秘神灵主观臆造而成,但在现实情境中,人工智能成为现实与虚拟交互的关键中介。受客观世界诸多条件的约束,现实向思想的趋近往往困难颇多,而虚拟世界的拓展,使虚实界限得以暂时让渡,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交互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什么是现实的,就是可能的。”^[25]这表明,现实性不仅涵盖了实存的状态与事实,更体现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与逻辑,证实了虚拟之中蕴含着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要素。同理,人工智能所创造的虚拟世界并无神圣的光环,而是现实性在虚拟世界中的充分展现。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现实世界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架构,还涉及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他人中介方式的重大变革,这种虚拟性预示了当前看似不可能实现的非现实、但未来有可能达成的“人的本质力量”。

四、结 语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因其具有显著的“智能”特性,难以将其归为传统的技术工具范畴。这种特殊性加剧了人类的恐慌与焦虑,越来越多的理论观点倾向于把人工智能视作人类自身创造的异化产物。本文回归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通过破解“智能”假象,阐释了人工智能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成果的内在逻辑,避免在当下众多的异化批判中丧失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理论自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加以防范。因此,未来有必要针对具体的异化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防止“人的本质力量”再次陷入抽象的理论阐释,真正实现人工智能的规范化应用。

参考文献:

- [1] 赫拉利. 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 AI 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M]. 林俊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XV.
- [2] 孙伟平. 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2):119-137.
- [3] 余乃忠. 积极的“异化”: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的本质力量”[J]. 南京社会科学,2018(5):53-57.
- [4] 张劲松. 人是机器的尺度:论人工智能与人类主体性[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33(1):49-54.
- [5] 段伟文. 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审度与伦理调适[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31(6):98-108.
- [6]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荣震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45.
- [7]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8]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吴晓明. 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J]. 学术月刊,2006(2):46-52.
- [11] 邓晓芒. 人工智能的本质[J]. 山东社会科学,2022(12):39-46.
- [12] 刘同舫. 唯物史观视域下人工智能本质的确证及其意义[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11(6):35-44.
- [13]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 [14] 李火林. 人的开放性与人的本质力量系统的生成[J]. 浙江学刊,1999(3):57-62.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 赫拉利. 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M]. 林俊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95.
- [17] 韩炳哲. 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M]. 谢晓川,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10.
- [18] 谢榕. 从卢德工人、新卢德派到数字工人:技术批判的建构主义思路探析[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22,44(4):80-89.
- [19] 卢梭.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 李平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85.
- [20] 高宣扬. 卢梭:浪漫主义的先驱[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0(5):41-50.
- [21] 唐正东. 对蒲鲁东的批判给马克思带来了什么?:《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史地位辨析[J]. 江苏社会科学,2010(2):1-6.
- [22]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M]. 贺麟,王太庆,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4.
- [23]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1.
- [24]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M]. 贺麟,王太庆,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97-98.
- [25]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M].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94.

(责任编辑:陈丽琼)